

## 紀昀在《四庫全書》館--以《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為考察中心

王鵬凱\*

### 中文摘要

在《四庫全書》館中三百六十位的工作官員，總纂官紀昀是主要的核心人物之一。本文根據《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的紀錄，分析其工作狀況，得知其貢獻是全面性的，舉凡獻書、校勘、編纂官書、推舉賢才種種，皆有功於《四庫全書》，而非侷限於撰寫提要一端而已。其對《四庫全書》的貢獻也是自始至終的，《四庫全書》館之主要核心人物，能如此者，僅紀昀一人而已，其一生可謂鞠躬盡瘁於《四庫全書》矣！

**關鍵字：**四庫全書館、紀昀、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

身為《四庫全書》總纂官的紀昀(1724-1805年)，其一生學術代表在於編纂《四庫全書》。紀昀在《四庫全書》館中的工作，實不只僅是單純撰寫提要而已，他對《四庫全書》的貢獻是全面性的，從重新尋獲《永樂大典》以致有後來朱筠建請核校《永樂大典》，進而成為編修《四庫全書》之舉。在廣徵天下遺書時，又名列精醇之本進書一百種以上前七名，得到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一部之獎賞。而《四庫全書》完成後，兩次大規模複校、《四庫全書薈要》複校工作，紀昀都有指揮及參與。甚至《四庫全書》完成後，對違礙之處的清查，紀昀仍是核心人物。直到嘉慶八年(1803年)，《四庫全書》最後的補遺工作，仍是在紀昀指揮下完成。紀昀可說是《四庫全書》唯一一位，自始至終參與的核心靈魂人物，其重要性越到編纂後期，越顯重要，其貢獻非僅撰寫《四庫全書總目》一端而已。今透過《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的紀錄，將其工作狀況分述如下。

### 一、自述工作情形

紀昀自己曾多次提及他和《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的關係，有的是直言校定、勘定《四庫全書》之事：

余校錄《四庫全書》，子部凡分十四家。<sup>1</sup>

余校定《四庫》所見不下數千家，其體已無所不備。<sup>2</sup>

---

\* 南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sup>1</sup> 〈濟眾新編序〉，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一冊，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179。

<sup>2</sup> 〈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207。

余勘定四庫書，頗恨其空言聚訟也。<sup>3</sup>

余校定秘書二十餘年，所見經解，惟《易》最多，亦惟《易》最濫。<sup>4</sup>  
有的是直言撰寫《四庫全書總目》：

余初學詩從《玉谿集》入，後頗涉獵於蘇、黃，於江西宗派亦略窺涯涘。嘗有場屋為余駁放者，謂余詆譏江西派，意在煽構，聞者或惑焉，及余所編《四庫書總目》出，始知所傳蜚語，群疑乃釋。<sup>5</sup>

余於癸巳受詔校秘書，殫十年之力，始勒為《總目》二百卷，進呈乙覽……凡《易》之象數、義理；《書》之今文、古文；《春秋》之主傳、廢傳；《禮》之王、鄭異同，皆別白而定一尊，以諸雜說為之輔。<sup>6</sup>

案相人之法，見於左傳，其書《漢志》亦著錄。惟太素脈、揣骨二家前古未聞。太素脈至北宋，始出，其授受淵源皆支離附會，依託顯然。余於《四庫全書總目》，已詳論之。揣骨亦莫所自起。<sup>7</sup>

此迦陵先生之故硯，伯恭司成以贈石庵相國。余偶取把玩，相國因以贈余。迦陵四六，頗為後來所嗤點，余撰《四庫全書總目》，力支柱之。<sup>8</sup>  
余撰《四庫全書總目》，亦謂虛中推命不用時，尚沿舊說。今附著於此，以志余過<sup>9</sup>

有論及撰寫《四庫全書總目》案語之事：

余作《四庫全書總目》，明代集部以練子甯至金川門卒，龔誦八人，列解縉、胡廣諸人前。併附案語曰：「謹案練子甯以下八人，皆惠宗舊臣也。考其通籍之年，蓋有在解縉等後者。然一則效死於故君；一則邀恩於新主，梟鷲異性，未可同居，故分別編之，使各從其類。至龔誦卒於成化辛丑，更遠在縉等後，今亦升列於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秋論定。紆青拖紫之榮，竟不能與荷戟老兵爭此一紙之先後」，黃泉易

<sup>3</sup> 〈遜齋易述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53。

<sup>4</sup> 〈黎君易注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55。

<sup>5</sup> 〈二樟詩鈔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00。

<sup>6</sup> 〈詩序補義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56。

<sup>7</sup> 〈灤陽續錄〉卷一，《紀曉嵐文集》第二冊，前揭書，頁 494。在《四庫全書總目》卷 110〈太素脈法〉提要、卷 105〈醫史〉提要，都曾批評太素脈法荒誕之說。

<sup>8</sup> 嘉慶戊午(嘉慶 3 年, 1798 年)十月, 紀昀為劉墉(號石庵)所贈硯作硯銘。紀昀:《閱微草堂硯譜》, 湖北美術出版社, 2002, 頁 23。

<sup>9</sup> 〈槐西雜誌〉卷二,《紀曉嵐文集》第二冊, 前揭書, 頁 305。本則紀昀對所撰的子部術數類《李虛中命書》提要(卷 109)之非, 不文過飾非、不諱言己過, 胸懷坦蕩, 實事求是, 足為後學的楷模。

逝，青史難誣，潘生是言，又安可以佻薄廢乎？<sup>10</sup>

也有言及《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編次：

惟《詩》則托始小序，附以辨說，以著爭端所自起，終以范蘅洲之《詩瀋》、姜白岩之《詩序補義》、顧古湫之《虞東學詩》，非徒以時代先後次序應爾也。<sup>11</sup>

余作《四庫全書總目》，明代集部以練子甯至金川門卒，龔詡八人，列解縉、胡廣諸人前。<sup>12</sup>

余校錄《四庫全書》，子部凡分十四家。儒家第一，兵家第二，法家第三，所謂禮樂兵刑國之大柄也。農家、醫家，舊史多退之於末簡，余獨以農家居四，而其五為醫家。農者民命之所關，醫雖一技，亦民命之所關，故升諸他藝術上也。<sup>13</sup>

又有稱撰寫《四庫全書總目》總序、類序：

故余撰《四庫全書·詩部總序》，有曰：「宋儒之攻漢儒，非為說經起見也，特求勝於漢儒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為說經起見也，特不平宋儒之詆漢儒而已。」韋蘇州詩曰：「水性自雲靜，石中亦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此之謂矣。<sup>14</sup>

余作〈詩類總序〉有曰：「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予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與！」<sup>15</sup>

余向纂《四庫全書》，作〈經部詩類小序〉曰：「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出爾反爾，勢于何極。」<sup>16</sup>

<sup>10</sup> 〈姑妄聽之〉卷四，《紀曉嵐文集》第二冊《閱微草堂筆記》，前揭書，頁 479。《四庫全書總目》下冊卷 170 案語：「案練子寧以下諸人，據其通籍之年，蓋有在解縉諸人後者。然一則死革除之禍，效命於故君，一則迎靖難之師，貢媚於新主。薰蕕同器，于義未安。故分列編之，使各從其類。至龔詡卒於成化己丑，更遠在縉等之後。今亦升列縉等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秋論定。紆青拖紫之榮，竟不能與荷戟老兵爭此一紙之先後也。」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2287。

<sup>11</sup> 〈詩序補義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56。

<sup>12</sup> 〈姑妄聽之〉卷四，《紀曉嵐文集》第二冊，前揭書，頁 479。

<sup>13</sup> 〈濟眾新編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79。

<sup>14</sup> 〈灤陽消夏錄〉卷一，《紀曉嵐文集》第二冊，前揭書，頁 10。

<sup>15</sup> 〈詩序補義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56-157。

<sup>16</sup> 〈周易義象合纂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54。

凡《易》之象數、義理；《書》之今文、古文；《春秋》之主傳、廢傳；  
《禮》之王、鄭異同，皆別白而定一尊，以諸雜說為之輔。<sup>17</sup>

雖然有人認為「紀昀所言不實，自我表揚，將其他人的勞績一筆抹殺，似有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之嫌。以此一面之詞為證據，明顯缺少旁證。紀昀在所撰《進表》及其他文章時又將著作權推給清高宗」<sup>18</sup>。紀昀如此公開地撒了漫天大謊，為何不見學者群起攻之<sup>19</sup>？就算紀昀當時算是顯赫人物，全天下學者竟無一人敢捋虎鬚？乾嘉之後，道、咸、同、光朝之人，也豈無一人是丈夫？反倒是有多人認為他寫成《四庫全書總目》<sup>20</sup>。

## 二、重新尋獲《永樂大典》之功

《四庫全書》乃清高宗有意紹承「盛世修書」的傳統所修纂之書，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自乾隆六年(1741年)正月四日<sup>21</sup>、三十七年(1772

<sup>17</sup> 〈詩序補義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156。

<sup>18</sup> 司馬朝軍〈紀昀與《四庫全書總目》〉，《圖書館雜誌》，2007年2期，頁72。

<sup>19</sup> 雖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中有：「《四庫總目》雖紀文達、陸耳山總其成，然經部屬之戴東原；史部屬之邵南江；子部屬之周書昌，皆各集所長」一說，但郭伯恭已經詳辨其非了，說見《四庫全書纂修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頁215-216。著名數學史專家錢寶琮也曾經提出一說：「四庫天文算法類書……，篇後題名者胥屬紀昀、陸錫熊、戴震三人，昀與錫熊在四庫館皆總纂官之職，天文算法非所諳習。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筆無疑」，但司馬朝軍也為文詳辨之，說見〈戴震與《四庫全書總目》〉一文，《圖書館雜誌》，2007年2期，頁68-69。但這都是指出某些篇章為某人所做，並未有直斥紀昀貪功之說。

<sup>20</sup> 與紀昀同時代人物都如此認定，如朱珪〈紀曉嵐墓誌銘〉：「公館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為《全書總目》，哀然巨觀。」〈祭紀昀文〉「生入玉關，總持四庫，萬卷提綱，一手編注。」《知足齋續集·五老會詩》：「宗伯河間姪，口吃善著書。沈浸四庫間，提要萬卷餘。」翁方綱〈東墅復次前韻，有懷鍾山院長盧抱經學士、錢辛楣管事，且及二君經學，因復次答，兼懷二君之二自注〉：「昨見曉嵐援辛楣(錢大昕)《曹全碑跋尾》一條，著於《四庫書錄》。不特徵定論之公，亦見友朋服善之益也。」阮元〈紀文達公遺集序〉：「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扶輿提綱，溯源徹委。所擬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衷諸是，持論務得其平。」清仁宗嘉慶皇帝〈御賜碑文〉：「美富羅四庫之儲，編摩出一人之手。」劉權之〈紀文達公遺集序〉：「(高宗純皇帝)特命吾師總纂。《四庫全書總目》，俱經一手裁定。」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其在翰林校理《四庫全書》七萬餘卷，《提要》一書，詳述古今學術源流，文章體裁異同分合之故，皆經公論次，方著於錄。」江藩《漢學師承記》：「《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昭槁《嘯亭雜錄》：「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見稱於世者，惟曉嵐宗伯無書不讀，博覽一時。所著《四庫全書總目》總匯三千年間典籍，持論簡而明，修辭淡而雅，人爭服之。」

<sup>21</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4，台北：華聯出版社，1964年，第3冊，頁2008。

年)正月四日<sup>22</sup>，他兩度下詔徵採天下遺書，後得到安徽學政朱筠(1729-1781年)上摺響應並建請校核中祕書籍《永樂大典》：

臣在翰林，常翻閱前明《永樂大典》。其書編次少倫，或分割諸書以從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恆覩者，輒具在焉。臣請勅擇取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為書，以備著錄。書亡復存，藝林幸甚！<sup>23</sup>

乾隆硃批「原議大臣議奏」<sup>24</sup>，後大學士劉統勳等奏議覆朱筠所陳採訪遺書意見<sup>25</sup>，得到乾隆首肯，並指示「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sup>26</sup>、「將擇其醇備者，付梓流傳。餘亦錄存匯輯，與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統按經史子集，編定目錄，命為《四庫全書》。俾古今圖籍，蒼萃無遺，永昭藝林盛軌」<sup>27</sup>，遂由《永樂大典》輯佚工作，擴大為編纂《四庫全書》之舉。

朱筠在翰林院時得以翻閱久不知下落的《永樂大典》，還要歸功於紀昀。清初，《永樂大典》因乏人問津而一度下落不明，所以顧炎武《日知錄》以為《永樂大典》已經亡佚了；朱彝尊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舉博學鴻詞科，尋入值南書房，也曾因尋訪不獲而發出感嘆地說《永樂大典》或許已被「李自成褫馬蹄矣」。其後《永樂大典》雖被尋獲，但乏人聞問，歲深日久之後，又一度無人知道典藏於何處。紀昀的門人劉權之在〈紀文達公遺集序〉中提到紀昀如何重新尋獲《永樂大典》這件事：

及在翰林署齋戒，始於敬一亭上得《永樂大典》，朱竹垞尋訪不獲，已云：「李自成褫馬蹄矣！」不知埋藏灰塵中三百餘年也。數月中每於值宿之暇翻閱一過，已記誦大半。乾隆三十七年，朱笥河學士奏聞高宗純皇帝敕輯《永樂大典》，並搜羅遺書，特命吾師總纂《四庫全書總目》，俱經一手裁定，故所存者惟此獨全。<sup>28</sup>

朱筠和紀昀皆為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同科進士，朱筠之弟朱珪(1731-1807

<sup>22</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00，前揭書第 18 冊，頁 12947。

<sup>23</sup> 〈安徽學政朱筠奏陳購訪遺書及校核《永樂大典》意見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 20。

<sup>24</sup> 同上注，前揭書，頁 22。

<sup>25</sup> 〈大學士劉統勳等奏議覆朱筠所陳採訪遺書意見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50-55。

<sup>26</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26，前揭書第 19 冊，頁 13416。

<sup>27</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29，前揭書第 19 冊，頁 13463。

<sup>28</sup> 《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 725。

年)也和紀昀為鄉試同榜，兄弟倆和紀昀的交情非同一般，朱筠去世時，紀昀還親輓一聯曰：「學術各門庭，與子平生無唱和；交情同骨肉，俾余後死獨傷悲」<sup>29</sup>，所以紀昀任職翰林院時<sup>30</sup>，重新尋獲《永樂大典》，當然樂於和朱筠分享此一成果，這也是朱筠所說的「臣在翰林，常繙閱前明《永樂大典》」的由來，所以朱筠有此奏議，紀昀亦有功焉。

朱筠的建議為朝廷採行後，紀昀對於校輯《永樂大典》，也有籌定事例與指揮輯佚之功。四庫館臣鄒炳泰(?-1820)在《午風堂集》中提到了紀昀邀集諸人到他家的綠意軒聚會，商量籌定校輯《永樂大典》事例之事。共會的有劉權之(劉書臺)、林澍蕃(林香海)，葛正華(葛靈蹊)等人，這說明了紀昀在一開始校輯《永樂大典》時，就積極地參與和規劃此事：

編輯《永樂大典》初啟局，紀曉嵐先生邀集綠意軒，籌定事例。同與者劉書臺雲房、葛靈蹊、林香海諸前輩。<sup>31</sup>

《永樂大典》的輯佚之功，除了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的：「元以前佚文祕典，世所不傳者，轉賴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排纂校訂復見於世」<sup>32</sup>，宋元以來的奧籍祕典，往往賴是編以存。還有開啟清代輯佚學風之功，梁啟超對此評論道：

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其書之采自《永樂大典》者以百計，實開輯佚之先聲。此後茲業日昌，自周秦諸子，漢人經注，魏晉六朝逸史逸集，苟有片語留存，無不搜羅最錄。其取材則唐宋間數種大類書，如《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最多，而諸經註疏及他書，凡可搜者無不遍。當時學者從事此業者甚多，不備舉。而馬國翰之《玉函山房輯佚書》，分經、史、子三部，集所輯至數百種，他可推矣。遂使《漢志》諸書、《隋唐志》久稱已佚者，今乃累累現於吾輩之藏書目錄中，雖復片鱗碎羽，而受賜則既多矣。<sup>33</sup>

其他如法式善、阮元等據以編校《全唐文》；文廷式、繆荃孫、趙萬里、王國維、唐圭璋等人也都據此而取得很好的成績，推本溯源，重新尋獲《永樂大典》的紀昀，也算有先導之功。

<sup>29</sup>梁章鉅《楹聯叢話》卷十，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頁131。

<sup>30</sup>紀昀自乾隆19年舉進士授庶吉士，到乾隆27年(1762年)受命出任福建學政。

<sup>31</sup>鄒炳泰《午風堂集》卷三，頁7，收在《續修四庫全書》第146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19。

<sup>32</sup>《四庫全書總目·永樂大典》提要語，前揭書，頁1808。

<sup>33</sup>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98-99。

### 三、進書之功

編纂《四庫全書》書籍的來源主要有四：內府藏書、各地徵書、《永樂大典》輯佚書、清廷官修書。各地徵書工作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開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結束，歷時七年之久，徵得一萬三千餘種書籍。乾隆為了表彰進書者，還制定了賞書、題詠記名等獎勵辦法：

國家當文治修明之會，所有古今載籍，宜及時蒐羅大備，以充策府而裨藝林。因降旨各督撫加意採訪，彙上於朝……，其進書百種以上者，並命擇其中精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幾餘親為評詠，題識簡端……。今閱進到各家書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兩淮之馬裕一家，為數至五、六、七、百種……。著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以為好古之勸。又進書一百種以上之江蘇周厚堉、蔣曾瑩，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璫及朝紳中黃登賢、紀昀、勵守謙、汪如藻等，亦俱藏書之家，並著每人賞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sup>34</sup>進書超過 500 種者凡四家，進書超過百種以上者，共九家，多為江浙藏書世家。紀昀進呈之書計 105 種，得著錄者凡 62 種、存目者 43 種，為北方藏書家進書之首。能得到皇帝題識進書簡端者，天下不過僅九家而已，無怪乎紀昀視為無上光榮：「名題雲笈，一編為百代之榮；字染天香，四海祇九家之本」<sup>35</sup>。進書之舉，除顯示紀昀為書香世家外，亦可見紀昀響應熱烈之功。

### 四、《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撰寫

乾隆於三十七年(1772 年)下旨廣徵天下遺書時，即已訂下撰寫提要之規定：但各省蒐輯之書，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鑑別，悉行呈送，煩複皆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法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指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候彙齊後，命廷臣檢覈，有堪備覽者，再開單行知取進。<sup>36</sup>

《四庫全書》開編之始，也指示：「釐其應刊、應鈔、應存者，係以提要，輯成總目。依經、史、子、集，部分類聚，命為《四庫全書》」<sup>37</sup>。紀昀因其座師劉統勳之推薦，與陸錫熊同為「總辦」之職<sup>38</sup>，任務為「各書詳檢確核，

<sup>34</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58，前揭書第 19 冊，頁 13980。

<sup>35</sup> 〈進呈書籍蒙賜內府初印《佩文韻府》奏謝折子〉，《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74。

<sup>36</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00，前揭書第 18 冊，頁 12947。

<sup>37</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34，前揭書第 19 冊，頁 13535。

<sup>38</sup> 「至各書詳檢確核，撮舉大綱，編纂總目，其中繁簡不一，條理紛繁，必須斟酌綜覈，

撮舉大綱，編纂總目」。後職稱改為「總纂」，工作性質主要仍為撰寫提要，二人還因表現優異，屢得賞賜、拔擢、寬宥：

辦理《四庫全書》處將《永樂大典》內檢出各書，陸續進呈。朕親加披閱，間予題評，見其考訂分排，具有條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觀，則成于紀昀、陸錫熊之手。二人學問本優，校書亦極勤勉、甚屬可嘉。紀昀曾任學士，陸錫熊現任郎中，著加恩均授為翰林院侍讀，遇缺即補，以示獎勵。<sup>39</sup>

至紀昀不能約束伊子，致令借欠生事，固屬咎有應得，但其學問尚優，為《四庫全書》處得力之人，著從寬改為降三級留任，仍令在館辦裏總纂事務。<sup>40</sup>

但念紀昀於《四庫全書》總纂事務，實屬盡心出力。嗣後遇有該員應升缺出，著加恩准其一體開列。<sup>41</sup>

其總纂官紀昀、陸錫熊、總校官陸費墀，所辦書籍既多，竟應免其處分。<sup>42</sup>

至陸費墀、陸錫熊、紀昀雖均已加恩擢用，但纂辦各書，均為出力，著賞給緞匹、荷包、筆、墨、紙、硯，以示獎勵。<sup>43</sup>

乾隆又因《四庫全書》萬餘種提要至為繁多，難以卒讀，命紀昀另撰《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但就算是《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數份量已縮減至十分之一，還是讓他發出：「簡明目錄從頭閱，向若已驚徒眈洋！」的感嘆，且在詩後自注：

向因編輯全書總目提要，卷帙甚繁，令紀昀別刊簡明書目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以便繙閱，然已多至二十卷，檢查亦殊不易。<sup>44</sup>

是《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為紀昀所撰無疑。

---

方不致有參差罅漏。臣等公同酌議，查現在纂修翰林紀昀，提調司員陸錫熊，堪膺總辦之任。」〈辦理《四庫全書》處奏遵旨酌議排纂《四庫全書》應行事宜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76-77。

<sup>39</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41，前揭書第 19 冊，頁 13686。

<sup>40</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72，前揭書第 20 冊，頁 14273。

<sup>41</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94，前揭書第 20 冊，頁 14598。

<sup>42</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29，前揭書第 21 冊，頁 15132。

<sup>43</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51，前揭書第 21 冊，頁 15440。

<sup>44</sup> 愛新覺羅·弘曆：〈題文津閣〉，《御製詩五集》卷 67，頁 1，收在《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10 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編，1976 年）。



至於《四庫全書總目》，無論紀昀同時之人、後人，一向多視之為紀昀所著，這對同為總纂官之陸錫熊、孫士毅，豈非不平？筆者曾為文論析之<sup>45</sup>，就三人在館任職時間，得出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應為紀昀所撰無疑，今扼要說明如下。

首先就職責而言，四庫館設有纂修官和總纂官，纂修官按照發下的校書單，完成校閱和擬定提要初稿後，即送交總纂官審閱核定，送交的提要初稿中，包含纂修官所撰提要、處理意見和記簽記錄。兩者間差異，早有學者如葉昌熾、譚獻、黃雲眉、劉承幹、陳垣、尹炎武、郭伯恭、黃愛平等人，將提要稿和後來刊行的《四庫全書總目》相較，從評騭意見、篇目內容到風格體例、語言文字，發現兩者之間有不同程度的改易，有的則幾乎另起爐灶，全篇改寫<sup>46</sup>。近年來又有多位學者對於姚鼐、翁方綱、鄭際唐、程晉芳、余集、邵晉涵諸人的提要稿進行與《四庫全書總目》比對的工作，也是證明各纂修官所寫的提要稿還是和《四庫全書總目》定稿有一定程度的差異<sup>47</sup>。所以，萬

<sup>45</sup>王鵬凱〈紀昀撰《四庫全書總目》說之論析〉，《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97 期，2009 年 10 月，頁 46-77。

<sup>46</sup>諸家所言，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卷四云：「乾隆中開四庫館，姚惜抱鼐與校書之列，其擬進書題以今《提要》勒之，十但採用二三。惜抱學術與文達不同，宜其柄鑿也。」譚獻《復堂日記》云：「聞邵二雲先生集諸史提要，語見淵源，深知玄解，因檢官本互勘，多所刪改矣。」黃雲眉《邵二雲先生年譜》指出：「邵之提要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載，字句頗多異同。若《史記提要》、《後漢書提要》、《新唐書提要》則面目迥殊。」劉承幹《四庫全書表文箋釋序》云：「予愛讀《提要》，常欲求分纂提要諸人之書，以考校其異同。癸丑得翁蘇齋學士所纂提要手稿一百五十冊，則與今本《提要》殊異者殊多。」陳垣、尹炎武撰〈影印《四庫全書》原本提要緣起〉亦指出：「現行《四庫全書總目》本擷取各書提要而成，後經文達筆削一貫，其間排列次第，與閣中所度，出入固多，而尤以提要原文，相差太甚。原本提要與現行《總目》相對，無有一編無異同者，其通編不同，各類皆有，與《總目》互校，異同詳略，亦不勝列舉也。蓋文達《總目》原離本書而孤行，復與各類相呼應。……吻合提要原文，雅非所計。」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漫取文津閣書二十餘種與《總目》及邵(晉涵)氏分纂稿互校……，邵氏原撰之舊已十不存一……，《提要》各稿，嗣經紀氏畫一之後，則原撰者之意趣精神早已無存。……，今之《總目》，則純屬紀氏一家之言矣。試校之《總目》與邵氏《分纂稿》，當知吾言之不虛也。」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四庫全書總目》與今存各家提要稿，幾乎無一相同。」

<sup>47</sup>如杜澤遜〈讀新見姚鼐一篇四庫提要擬稿〉，《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 年 3 期，頁 43。季秋華〈從《惜抱軒書錄》看纂前提要與纂後提要之差異〉，《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99 年 5 期，頁 40。徐雁平〈《惜抱軒書錄》與《四庫全書總目》之比較〉，《文獻》，2006 年 1 期，頁 131-132。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3，頁 202。樂怡〈翁方綱纂《提要稿》與《四庫提要》之比較研究〉，《圖書館雜誌》，2006 年 4 期，頁 76。杜澤遜〈讀新見鄭際唐一篇四庫提要擬稿〉，《中國典籍

餘篇提要雖非皆總纂官所為，但改定提要稿，使之成為《四庫全書總目》之功，仍在於總纂官。因此周積明綜合諸家之說而後論言：

由此可見，分纂稿誠然為《總目》的撰寫提供了一定的基礎，但從分纂稿到《總目》決非簡單的潤色修飾，而是一種脫胎換骨式的再改造。經過這番改造，原來的分纂稿被整合成以紀昀學術文化觀念為內核的新的提要系統。<sup>48</sup>

其次就三位總纂官在館任職時間而言，孫士毅在四庫館任職短暫，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雲貴總督李侍堯貪瀆案發，孫士毅以失察遣戍伊犁，簿錄其家，不名一錢。乾隆嘉其廉，改授翰林院編修，纂編《四庫全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於乾隆四十六年底抄畢，四十七年入閣收藏。袁枚為孫士毅所撰的〈神道碑〉一文中僅稱：「簿錄其家，不名一錢。上嘉公廉，未至軍臺，起用為翰林院編修……，旋授山東布政使，巡撫廣西、調廣東」<sup>49</sup>；且士毅之孫孫均在《百一山房詩集·跋》<sup>50</sup>中也未言及其祖纂修《四庫全書》之功。足見孫士毅於《四庫全書總目》的完成，著力甚微，雖名列總纂官之一，然親友也不以為意，故皆未曾言及此事。真正出力最著者，當為紀、陸二人，是以于敏中才說：「提要稿吾固知其難，非經足下(陸錫熊)及曉嵐學士之手，不得為定稿」<sup>51</sup>；乾隆也只獎賞二人之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現已辦竣呈覽，頗為詳核，所有總纂官紀昀、陸錫熊著交部從優議敘」<sup>52</sup>。至於另一位總纂官陸錫熊，其貢獻應是在於閣本書前提要，而不在於殿本《四庫全書總目》之上。閣本書前提要乃是總纂官依據分纂官提要稿改定後抄錄於七閣所收各書卷首的提要。閣本的書前提要，現存文淵、文溯、文津三閣完整的書前提要，不僅彼此互異且水準參差<sup>53</sup>，事實上三閣書前提要又和殿本《四庫全書總

---

與文化》，1998年3期，頁38。杜澤遜〈讀新見程晉芳一篇四庫提要分撰稿〉，《圖書館建設》，1999年5期，頁71。蘇虹〈關於邵氏《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圖書館學刊》，2005年4期，頁130。李祚唐〈余集《四庫全書》提要稿研究價值淺論〉，《學術月刊》，2001年1期，頁79。

<sup>48</sup>周積明《紀昀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77。

<sup>49</sup>袁枚《百一山房詩集·神道碑》，《續修四庫全書》第143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63。

<sup>50</sup>同上注前揭書，頁516。

<sup>51</sup>《于文襄公(敏中)手札》二十八日函，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2輯211-212(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頁94。

<sup>52</sup>《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125，前揭書第23冊，頁16453。

<sup>53</sup>《四庫全書》在成書後，曾作過兩次全面複查(乾隆52、56年)，而這兩次複查的起因

目》有所出入，經過學者的研究發現，兩者之間仍有許多的差異，足見從閣本的書前提要，到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的完成，中間還是有許多修改的工作<sup>54</sup>。而《四庫全書總目》，早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即完成初稿，其後卻是不斷地進行修改，遲遲無法刊定，直到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方纔竣工刷印裝潢<sup>55</sup>，而此時陸錫熊已早在兩年多前(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以天氣驟寒，

---

都是從文津閣本被乾隆發現錯誤引起的。而文溯閣提要，「顯而易見，文溯閣書前提要內容過於簡略、單薄，其撰寫水平及其價值無法與《總目》提要相比。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原因是文溯閣《全書》遠存東北故宮，其作用只為皇帝游幸時御覽，加之成書時間倉促，故經辦大臣為簡省了事，多以館臣初稿所撰提要初稿稍加條理，即隨書抄錄而成。而館臣初稿粗精不等，且此閣只是備用，自然上下人等付出的工夫均不會如供御覽的文淵閣《全書》書前提要那樣工夫深湛」(陳曉華〈《四庫全書》三種提要之比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 3 期，頁 64)；而「文淵閣《全書》的書前提要內容多與《總目》提要相近，由此可知文淵閣書前提要加工較多，而《總目》提要也多為在此基礎上刪削潤色而成。粗略比較《總目》提要在定稿前對文淵閣《全書》約 1/3 的書前提要內容作了或多或少的改動。具體的分布則是經、集多異，史、子多同，名篇多異，一般多同。原因很簡單，紀昀擅長經、集，而於史、子不諳；又名篇為關注對象，所以紀昀等用力尤勤」(陳曉華〈《四庫全書》三種提要之比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 3 期，頁 64)。<sup>54</sup>今略舉數家之言：「《總目》與庫本提要之間內容有不少差異，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同義替換、語序變更、詳略不同、評價微殊」(司馬朝軍〈殿本《四庫全書總目》與庫本提要之比較〉，《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5 年 2 期，頁 63)，「顯而易見，文溯閣書前提要內容過於簡略、單薄其撰寫水準及其價值無法與《總目》提要相比……，文淵閣《全書》的書前提要內容多與《總目》提要相近，由此可知文淵閣書前提要加工較多，而《總目》提要也多為在此基礎上刪削潤色而成」(陳曉華〈《四庫全書》三種提要之比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 3 期，頁 62-64)，「就總體而言，閣書提要還不很成熟，在文字、體例、內容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問題，反映了纂修官原撰提要向《總目》定稿進行過渡的情況。而《總目》在閣書提要基礎上，又經修改提高，全書體例整齊，思想統一，注重指示學術門徑，詳於內容介紹、文字考訂、得失評論乃至源流敘述」(黃愛平〈《四庫全書總目》與閣書提要異同初探〉，《圖書館學刊》，1991 年 1 期，頁 41-43)。

<sup>55</sup>〈原戶部尚書曹文植奏刊刻《四庫全書總目》竣工刷印裝潢呈覽摺〉，曹文植稱：「竊臣於乾隆五十一年奏請刊刻《四庫全書總目》，仰蒙俞允，並繕寫式樣，呈覽在案。續因紀昀等奉旨查辦四閣之書，其中提要有須更改之處，是以停工未刻。今經紀昀將底本校勘完竣，隨加緊刊刻畢工。謹刷印裝潢……，現交武英殿收貯。」(《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374)另據《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493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甲午條記：「予告尚書曹文植奏，《四庫全書總目》刻竣。謹進陳設二十部，備賞八十部。餘將板片交武英殿收藏外，並另刷四部，請發裝潢，分貯四閣。至是書最易繙閱，應照向辦官書，刷印發坊領售。報聞。」(前揭書第 30 冊，頁 22153。)則知曹文植早在於乾隆五十一年即奏請刊刻《四庫全書總目》，但因提要有須更改之處，是以停工未刻。後經紀昀將底本校勘完竣，至乾隆六十年十一月才刊刻畢工，隨經乾隆乾隆批准刊印方式。這些紀錄除了說明了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完成的日

裘衣未到，凍僵於旅寓中」<sup>56</sup>，病逝於前往重校文溯閣《四庫全書》的途中，因此完成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的任務，就要靠紀昀獨力完成了。換言之，提要稿可視為各纂修官學術思想的展現；閣本書前提要，可視為三位總纂官學術思想的展現；至於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則可視為紀昀學術思想的展現<sup>57</sup>，各得其實，無所偏廢，應是公允之說。紀昀一來是首席總纂官，在完成《四庫全書總目》的過程中，不僅對纂修官的提要稿進行修改，甚至也有對其他總纂官的修改稿有審核的情形<sup>58</sup>，足見紀昀的工作職務是有決定性的作用。二來，陸、孫二人皆未能全程參與，是紀昀始終其事而總其成者。其三，以《資治通鑒》作者掛名為例，劉放、劉恕、范祖禹、司馬康等人皆有分任撰寫之功，然而後人論及此書，皆歸功於司馬光，紀昀於《四庫全書總目》既然有親力為之、始終參與、決定去取之功，因此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的完成，榮耀歸之於紀昀豈曰不宜！

#### 五、校勘《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薈要》

《四庫全書》開館時，乾隆已是 63 歲高齡，後惟恐不得躬睹《四庫全書》之完成，遂轉生濃縮全書之構想，於三十八年(1773 年)五月一日諭令編修《四庫全書薈要》：「著於全書中擷取菁華，繕為薈要，其篇式一如全書之例，蓋彼極其博，此取其精，不相妨而適相助，庶縹緲羅列，得以隨時流覽，更足資好古敏求之益」<sup>59</sup>。此套《四庫全書薈要》原本專供乾隆自覽，故於質量要求，更甚於《四庫全書》，編修之始即責成總裁大臣妥立章程，臣工也建請添派薈要繕本覆校官六員，得旨依議：

現在纂辦《四庫全書》以廣石渠金匱之藏，自應悉心校繕，俾免魯魚

---

期外，還指出了紀昀對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的改訂之功。

<sup>56</sup>梁章鉅《楹聯叢話》卷十，前揭書，頁 133。

<sup>57</sup>有學者依據現存的提要殘稿來分析，一致認為這些提要稿的批改者是紀昀，如黃燕生〈校理《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的再發現〉，《中華文史論叢》，48 集，頁 209。李國慶〈紀曉嵐潤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舉例〉，《山東圖書館季刊》，2008 年 3 期，頁 75。丁芬〈《四庫全書總目》殘稿及其文獻價值〉，《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08 年 8 期，頁 54-55。另李賢強、吳宏歧〈新發現紀昀所修改之四庫提要〉，《江漢論壇》，2015 年 12 月，頁 85-90，也以為《四庫全書總目》涉及《玉台新詠》的提要，都是經過紀昀修改或親撰的。

<sup>58</sup>「從上海圖書館所藏提要殘稿分析，《辨言》重寫提要稿出自陸錫熊之手。在此篇提要旁另有朱筆批語：『依此本改』四字，審為紀昀手筆」，司馬朝軍〈陸錫熊對四庫學的貢獻〉，《圖書情報知識》，2005 年 6 期，頁 56。

<sup>59</sup>《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34，前揭書第 19 冊，頁 13535。

亥豕之訛。今進呈已經繕成之薈要各卷內，信手繙閱，即有錯字二處，則其書寫舛誤者，諒復不少。若不定以考成，難期善本。其如何妥立章程，俾各盡心校錄無訛之處，著總裁大臣詳議具奏。<sup>60</sup>

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第一次大規模複校《四庫全書》後，乾隆也命紀昀主事複校《四庫全書薈要》；五十六年(1791年)，第二次大規模複校《四庫全書》時，軍機大臣阿桂也奏請於複校四閣《四庫全書》完畢後，由紀昀、陸錫熊複校二份《四庫全書薈要》，但陸錫熊則在前往關外複校文溯閣《四庫全書》的途中，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病逝於途，其後實際複校工作，仍由紀昀負責：

文淵、文源、文津三閣《四庫全書》，前已派員逐分校閱，將錯誤處所，詳晰簽改。至文溯閣全書一分，現在應往盛京，原勘之陸錫熊等業已差滿，俟到齊即行前往校辦。其《薈要》二分，尚未重加校正。著派懋勤殿翰林會同紀昀，悉心勘校，以期並臻完善。<sup>61</sup>

又查藻堂、味腴書室所藏《薈要》二分，亦有留空函書，卷冊較少，業於上年經臣等議將詳校文溯閣書內之應議總校、分校各員陸續校竣。但恐尚有舛誤，亦應請俟四閣書籍詳校全竣後，交與紀昀，陸錫熊二人就近抽查，如有駁換，并交武英殿查明，分別賠寫。<sup>62</sup>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乾隆因翻閱文津閣所貯《四庫全書》發現其中訛謬甚多，推想文淵、文源二閣所貯《四庫全書》，其訛舛處所，亦皆不一而足，因而下令進行複校。其後又在五十六年(1791年)七月，因翻閱文津閣所貯《四庫全書》之《楊子法言》發現漏寫事項，故而乾隆龍顏大怒，再次諭令原參與編輯官員進行大規模複校工作。第一次複校《四庫全書》，質郡王永瑑奏請由彭元瑞、紀昀總司其事「竊照文淵、文源兩閣所貯四庫全書訛舛甚多，自應詳加校正，今擬派部院各官共二百五十餘員，兩閣各分一百二十餘員，專司校閱……，應請旨令彭元瑞、紀昀總司其事，毋庸兼看書籍」<sup>63</sup>。第二次複校《四庫全書》，乾隆更直斥紀昀之過：

前因《四庫全書》內錯誤甚多，特令總纂等詳加校閱。並恐熱河文津

<sup>60</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44，前揭書第 19 冊，頁 13766。

<sup>61</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42，前揭書第 27 冊，頁 19919。

<sup>62</sup> 〈軍機大臣阿桂等奏酌議紀昀請籌辦新添空函諸書情形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245。

<sup>63</sup> 〈質郡王永瑑等奏遵旨酌定校勘文淵文源閣全書章程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008-2009。

閣所度全書，亦多魯魚亥豕之訛，復令紀昀帶同詳校各官細心閱看。該員等自應認真校勘，將書中脫落訛舛之處，逐加改正，俾臻完善。今朕偶閱文津閣《四庫全書》內《揚子法言》一書……今篇內甚至脫去二行，紀昀等實難辭咎，寧不自知慚惡耶？況朕曾有〈御製書《揚雄法言》〉一篇，雖係近年之作，亦應繕錄，弁於是書之首。紀昀並未留心補入，更屬疏忽。紀昀及詳校官莊通敏，俱著交部分別議處……，著紀昀親赴文淵、文源二閣……，並帶同詳校各官，抽查此書卷首是否亦有空白之處，及此外各書有似此脫誤者，一體抽閱填改。如再不悉心詳檢，經朕看出，必將紀昀等加倍治罪，不能再邀寬貸也！欽此。<sup>64</sup>

是兩次複校《四庫全書》都是由紀昀所負責，因此紀昀才會多次上摺糾舉失職人員、行政疏失、報告工作情形：

查奉旨罰來熱河看書各員……惟朱鈐、呂雲棟、石鴻勳、陳木四員至今將滿一月，尚俱未到。<sup>65</sup>

據紀昀奏前赴熱河辦理抽換書匣各事宜一摺內稱：從前陸費墀排架時，凡係零帙，不論朝代門類，將數種合為一匣，以省配搭之煩，遂致紛紜錯亂。現經逐種抽出，歸還原次，並將書匣彼此互換，改刻匣面，無庸多為添造……四閣陳設全書，一切裝函排架事宜，俱係陸費墀一手承辦。今經紀昀查出，紛紜錯亂之帙甚多，則陸費墀前此辦理乖謬，已可概見。<sup>66</sup>

各該員俱感激悚惶，認真搜剔，臣亦往來巡察，不時抽看。計所簽舛漏，較初次詳校竟增數倍之多，凡一字、半字之空白，悉皆檢出，各調取底本補填。其餘卷頁脫落、行款參差以及流水錯誤者，亦俱抽換修整……至空白之中，有原注闕文一項，詳校官因已聲明，遂不查核。臣偶覺數處可疑，調取底本查對。中有實係原闕者；亦竟有底本不闕而憚於書寫，或已經挖補而懶於查填，竟自捏注闕文字者。實係有心弊混，與偶然舛漏不同……此外，更有底本遺失，抵以他書，正本未

<sup>64</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83，前揭書第 28 冊，頁 20550-20551。

<sup>65</sup> 〈禮部尚書紀昀奏參朱鈐等四員尚未到熱河校書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094。

<sup>66</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16，前揭書第 27 冊，頁 19485-19486。

全，偽註闕卷，致詳校官無從舉發者，弊混均屬相同。<sup>67</sup>

在第一次複校《四庫全書》時，紀昀更自認全面校勘明季清初史部、集部及子部之小說、雜記諸書之工作。正如陳寅恪所言：「然清室所最忌諱者，不過東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數十年間之載記耳」<sup>68</sup>，這段時期充滿著牴觸清朝之語的書籍，正是乾隆心中的一塊大疙瘩。在紀昀認校諸書之前，乾隆才對李清所著《諸史同異錄》中違礙之語，大動肝火，嚴斥館臣僅予刪節該書，而未能銷毀。紀昀此舉，應該是深合乾隆聖意，所以懲處反而是原總校官陸費墀獲咎尤重，不僅需獨力負責江南三閣賠寫款項，又被革任<sup>69</sup>，身歿還遭到抄沒家產的處分<sup>70</sup>。紀昀、陸錫熊則分攤文淵、文源、文津三閣賠寫費用：

現據紀昀奏請將《尚書古文疏證》內各條遵照刪改，陸續賠寫，並請將文源閣所貯，將明季、國初史部、集部及子部之小說、雜記諸書，自認通行校勘，凡有違礙即行修改，仍知會文淵、文津二閣詳校官畫一辦理，再行賠寫抽換，務期完善等語……。今紀昀既自認通行覆閱明末各書，並請將看出應換篇頁自行賠寫，交部議處，而陸錫熊則因現出學差，陸費墀丁憂回籍，轉得置身局外，是使紀昀一人獨任其咎，轉令現在派出之大小各員分任其勞，實不足以昭平允。著將文淵、文源、文津三閣書籍所有應行換寫篇頁，其裝訂挖改各工價，均令紀昀、陸錫熊二人一體分賠。至陸費墀……，現在續辦三分書應發文淵、文匯、文宗三閣陳設者……，所有面頁裝訂、木匣刻字等項，俱著陸費墀自出己貲，仿照文淵等三閣式樣罰賠，妥協辦理，就近陳設，以示懲儆，而服眾心，不必令鹽商等承辦。<sup>71</sup>

## 六、御敕官書之編纂

乾隆於編纂《四庫全書》時，往往起心動念，命館臣編訂書籍，以充《四庫全書》之備，其中有多種為紀昀所負責編纂。如乾隆命編《歷代職官表》，

<sup>67</sup> 〈左都御史紀昀奏文源閣書覆勘先完請將詳校官等分別議處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237-2238。

<sup>68</sup> 陳寅恪〈陳垣元西域華人化考序〉，收入《勵耕書屋叢刻》，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82，頁 1。

<sup>69</sup> 〈諭陸費墀革任之處著註冊等議處事〉，《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059。

<sup>70</sup> 「現在陸費墀業已身故，所有插架、裝匣等事……，並著海寧查明陸費墀原籍現有田房產業，加恩酌留一千兩之數，為伊家屬養贍，如尚有餘資，即作為添補三閣辦書之用」，〈寄諭浙江巡撫海寧等仿照前次發去裝潢書匣等式樣製造〉，《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205。

<sup>71</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282，前揭書第 26 冊，頁 18855-18856。

以清朝官制為主軸綱領，其下分列三代至明朝之歷代官制建置，援引文獻以考證沿革、比較異同，於每個官署部門或官職各列出一表，並將清代職官所設名稱、員額、品級、職掌記明於各表標題之下：

現在編列《四庫全書》，遺文畢集，著即派總纂、總校之紀昀、陸錫熊、陸費墀、孫士毅等，悉心校覈，將本朝文武內外官職階級，與歷代沿襲異同之處，詳稽正史，博參華籍，分晰序說，簡明精審，毋冗毋遺。<sup>72</sup>

書成後，紀昀指出官制的重要性：「大抵勢足以相維則乾綱不失，權有所偏屬則魁柄必移，故官制之得失，可以知朝政之盛衰也」<sup>73</sup>，同時也說明本書達到乾隆所要求的：「上下數千年分職率屬之制，元元本本，罔弗具焉……，包括古今、貫串始末、旁行斜上、援古證今、經緯分明，參稽詳密」<sup>74</sup>的要求，希望能藉此讓「百爾臣工，各明厥職，用以顧名而思義，亦益當知所做勸矣」<sup>75</sup>的作用。

又如研究遼朝歷史的重要歷史料--《契丹國志》，因參照當時甚多史書而成，可以與《遼史》相互參校，也可作為輯佚亡佚史書之用。但乾隆以其忽而內宋，則或稱遼帝，或稱國主；忽而內遼，則以宋帝年號，分注遼帝年號之下，體例混淆，書法訛舛，特命紀昀等加以改纂：

其他乖謬種種，難以枚舉……，惟體例書法訛謬，於綱目大義有乖者，不可不加釐正。著總纂紀昀等詳加校勘，依例改纂……，以昭綱常名教、大公至正之義。<sup>76</sup>

編纂《四庫全書》時，曾大量禁毀一些明末清初的著作，原因在於其中甚多違礙之處。但在處理明末著作中詞語牴觸清朝問題上，乾隆卻特別在意一些忠蓋之士的奏摺，因其言多出自愛君體國之誠，足以砥礪臣節，為臣工之楷模，所以屢次言及處理這類奏摺方式。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一月十六日上諭中，特別指出如劉宗周、黃道周、熊廷弼、王允成、楊漣、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元璐等明季忠臣之作，與朱東觀編輯《崇禎年間諸臣奏疏》違礙字句，只需改酌一、二語，無庸銷燬：

<sup>72</sup>《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115，前揭書第 22 冊，頁 16330。

<sup>73</sup>《四庫全書·歷代職官表》提要語，前揭書，頁 1065。

<sup>74</sup>同上注。

<sup>75</sup>同上注。

<sup>76</sup>《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143，前揭書第 23 冊，頁 16747-16748。



若劉宗周、黃道周立朝守正，風節凜然，其奏議慷慨極言，忠蓋溢于簡牘，卒之以身殉國，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場，材優幹濟，所上封事，語多剴切，乃為朝議所撓，至使身陷大辟。嘗閱其疏內，有「洒一腔之血於朝廷，付七尺之軀為邊塞」一語，親為批識云：「觀至此為之動心欲淚，而彼之君若不聞，明欲不亡，得乎！」可見朕大公至正之心矣。……又如王允成……，又如葉向高……，惟當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毀。又彼時直臣如楊漣、左光斗、李應升、周宗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元璐等，所有書籍，並當以此類推。即有一、二語傷觸本朝，本屬各為其主，亦只須改酌一、二語，實不忍並從焚棄，致令湮沒不彰……，近復閱江蘇所進應燬書籍內，有朱東觀編輯《崇禎年間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漸至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為殷鑒。雖諸疏中多有乖觸字句，彼皆忠於所事，實不見罪，惟當酌改數字，存其原書，使天下萬世，曉然於明之所以亡，與本朝之所以興。俾我子孫永念祖宗締造之艱難，益思兢兢業業，以祈天而永命。其所裨益，豈不更大，又何必亟燬其書乎！<sup>77</sup>

其後又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二月二十六日對徐必達、蕭近高、宋一韓、侯震暘等明人文集中違礙字句，以其人等，忠蓋之忱，溢於簡牘，乃下旨酌量改易，毋庸銷燬。令總裁遴選一、二人，詳悉校閱明人違礙書籍內，匡救時艱諸疏，選擇編輯繕錄成《明季奏疏》。這項工作又是交由紀昀負責：

況諸臣彈劾權奸，指摘利病，至不憚再三入告，實皆出自愛君體國之誠，而其姓名章疏，不盡見於《明史》。朕方欲闡幽微顯，又何忍令其湮沒弗彰？況諸臣在勝國言事，於我國家間有干犯之語，彼自為其主，不宜深責，非若身入本朝、肆為詆悖者可比。原不妨就其應存諸疏，將觸背字面略為改易選錄，餘仍分別撤燬，於辦理違礙書籍，亦屬並行不悖。著交該總裁遴選一、二人，詳悉校閱，編輯繕錄，以次呈覽，候朕鑒定。<sup>78</sup>

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七月二十七日，乾隆下旨對明神宗以後諸臣奏疏，做一通盤處理，指出若其言一事，陳一弊，切中利病，有裨時政者，裒集成《明名臣奏議》，並將先前紀昀等所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編成的《明季奏疏》，

<sup>77</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21，前揭書第 21 冊，頁 15013-15014。

<sup>78</sup> 〈諭內閣著將明人違礙書籍內匡救時艱諸疏選擇編為《明季奏疏》〉，《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1006-1007。

歸入此書，本書收入《四庫全書》時，定名為《欽定明臣奏議》，其提要稱：「每成一卷，即恭呈御覽，斷以睿裁。蓋敷陳之得失，足昭法戒。而時代既近，殷鑒尤明。將推溯勝國之所以亡，與昭代之所以興者，以垂訓于無窮，故重其事也」<sup>79</sup>，每成一卷，即恭呈御覽，足見乾隆之重視。而紀昀日後敢自認全面校勘明季清初史部、集部及子部之小說、雜記諸書之舉，其實早已於此時負責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就已駕輕就熟了：

至神宗以後諸臣奏疏內，有因遼瀋用兵，涉及本朝之處……，即有違礙字句，祇須略為節潤，仍將全文錄入，不可刪改。此事關係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所以興，敬怠之分，天人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觸目驚心……，所有前派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即著歸入此書，按其朝代，一體編纂。<sup>80</sup>

此外，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因治理黃河，要祭告河神，遣大學士阿桂之子阿彌達，前往青海，務窮河源，告祭河神。乾隆興起要探求黃河真源之念頭，考證實驗、參訂舊文，作〈河源詩〉一章、〈讀宋史河渠志〉一篇，「復命兵部侍郎紀昀、大理寺卿陸錫熊等，尋繹史傳，旁稽眾說，綜其向背，定其是非，輯為一書」<sup>81</sup>，是紀昀亦參與《河源紀略》編纂之工作。另，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命彭元瑞、紀昀詳考淮泗可以達河之說具奏，「著傳諭彭元瑞、紀昀、再加細繹考訂明確詳悉。伊等均系讀書博覽之人，如別有所見，不妨據實奏覆直陳」<sup>82</sup>，是紀昀於撰寫《四庫全書總目》外，多有編纂官書之事。

### 七、舉薦賢才入館

京師向來人文薈萃，紀昀多與天下名士相交，既入館為總纂官，豈有不舉薦賢才共纂《四庫全書》之理。紀昀曾應門人蔣士鎔之請，為趙希璜《〈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作序，言及：

趙君所與倡和者，余多未識。所識者，如李南澗(李文藻)為余庚辰所取士，周書昌(周永年)、戴東原(戴震)、余秋室(余集)皆以余荐修《四庫全書》，入翰林；孫淵如(孫星衍)為余讀卷所取士，其人并學問、

<sup>79</sup> 《四庫全書·欽定明臣奏議》提要語，前揭書，頁 777。

<sup>80</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143，前揭書第 23 冊，頁 16759-16760。

<sup>81</sup> 《四庫全書·河源紀略》提要語，前揭書，頁 950。

<sup>82</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51，前揭書第 27 冊，頁 20048。

文章具有端緒。知趙君之友，益知趙君之詩矣。<sup>83</sup>

是周永年、戴震、余集三人皆為紀昀所薦而入館，當然，紀昀舉薦之人，當不止此三人，這三人只是趙、紀二人共同的朋友。此人事之首肯，當自須經總裁于敏中、裘曰修二人之同意，因此周、戴、余或言為于、裘之薦而入館，亦無不可<sup>84</sup>，切莫因此以為紀昀貪功掠人之美。尤其是周、戴與紀昀甚為熟稔，《閱微草堂筆記》中紀錄周、戴二人與紀昀互動之事，周永年凡 7 次、戴震凡 9 次。戴震更是與紀昀相交二十多年的老友，紀昀將二人推薦入館，亦在情理之中：

東原與昀交二十餘年，主昀家前後幾十年，凡所撰錄，不以昀為陋，頗相質證，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sup>85</sup>

三人中，余集所撰提要稿久經散佚，僅存經部詩類七篇，收入《秋室學古錄》，殊為可惜。戴震所撰提要稿，段玉裁所撰《戴東原年譜》收入則有十四篇<sup>86</sup>。周永年久倡「儒藏說」，為《四庫全書》編纂做了輿論準備；進獻之書也達 32 種珍本；也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宋劉敞《公是集》、劉攽《公非集》、蘇過《斜川集》等重要典籍<sup>87</sup>，陳垣也稱：「《四庫提要》成書倉促，謬誤本多。惟釋家類著錄十三部，存目十二部，謬誤尚少……，吾頗疑其出於曆城周書昌永年也」<sup>88</sup>。各家提要稿雖所存不多，但不可以此抹殺其貢獻。

## 八、結語

透過上文敘述得知紀昀在《四庫全書》館的工作情形，其對《四庫全書》的貢獻是全面性的，舉凡獻書、校勘、編纂官書、推舉賢才種種，皆有功於《四庫全書》，而非侷限於撰寫提要一端而已。其對《四庫全書》的貢獻也是自始至終的，《四庫全書》館之重要核心人物，能如此者，僅紀昀一人而

<sup>83</sup>紀昀〈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08。

<sup>84</sup>余集自撰〈秋室居士自撰志銘〉：「裘文達公薦於朝」（《秋室學古錄》卷六，頁 25）、段玉裁《戴東原年譜》：「上開四庫館，于文襄公以紀文達公、裘文達公之言，荐先生於上……，召充纂修官」（《四部叢刊初編》第 1766 冊，景上海涵芬樓藏經韻樓刊本，戴東原集四附錄，頁 23）。

<sup>85</sup>紀昀〈與余存吾太史書〉，《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74。

<sup>86</sup>司馬朝軍〈戴震與《四庫全書總目》〉，則以此說為不妥，《圖書館雜誌》，2006 年 8 期，頁 69-71。

<sup>87</sup>寧聖紅〈周永年對《四庫全書》的貢獻〉，《山東圖書館季刊》，2005 年第 3 期，頁 115-117。

<sup>88</sup>《中國佛教史籍概論》，收入《陳援菴先生全集》第九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3 年，頁 27。

已。阮元〈紀文達公遺集序〉所稱：「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總其成」，絕非溢美之詞。早從重新尋獲《永樂大典》，就開啟了纂修《四庫全書》的先決條件。就算是《四庫全書》早已編纂完成，也仍要進行後續的校勘、補遺工作，使《四庫全書》能趨於完善，直至嘉慶八年(1803年)，他逝世前一年多，紀昀還以八十之高齡，奉命主持參與《四庫全書》最後一部分官修書籍的補遺工作<sup>89</sup>，一生可謂鞠躬盡瘁於《四庫全書》矣！其對《四庫全書》的重要性，也是日益重要，黃瓊誼曾論及此一情形：

在乾隆上諭的工作指示中，提到的人員名字、次序，也可以看出紀昀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負責的工作逐漸以他為首。

從〈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奉上諭〉：「所有進到各遺書，並交總裁等……，著該總裁等妥議具奏」、〈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奉上諭〉：「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觀，則成於紀昀、陸錫熊之手」、〈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諭〉：「著《四庫全書》總裁等，妥協查辦」、〈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奉上諭〉：「著即派總纂、總校之紀昀、陸錫熊、陸費墀、孫士毅等悉心校核」、〈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諭〉：「著總纂紀昀等詳加校勘，依例改纂」、〈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諭〉：「所有前派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即著歸入此書」。這些上諭無意中透露出乾隆心中對該工作所想到的首要人選，紀昀在乾隆心目中的份量，就在編纂《四庫全書》早期的「總裁等」，轉變成後期的「紀昀等」，就可以看出來了。<sup>90</sup>

紀昀在《四庫全書》館的工作，對紀昀本身的影響則有三點，其一就是完成了學術巨著武英殿本的《四庫全書總目》。其次，他有幸參與《四庫全書》的編纂，對他學問的增長絕對是有莫大的幫助。所以紀昀自稱：「自校理秘書，縱觀古今著作」<sup>91</sup>、「余校定《四庫》所見不下數千家」<sup>92</sup>，他也在〈自

<sup>89</sup> 〈諭內閣《四庫全書》內未繕入高宗詩文及續辦方略等書著一體增入皮藏〉：「尚書紀昀係纂辦四庫全書熟手，著即詳悉查明，開單具奏」，《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375。紀昀條陳辦理事宜十條以對，〈禮部尚書紀昀奏擬續繕《四庫全書》事宜十條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376-2379。

<sup>90</sup> 〈《四庫全書總目》對乾隆旨意依違之例--以集部為考察中心〉，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21 期，2011 年 10 月，頁 51。

<sup>91</sup> 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 729。

<sup>92</sup> 〈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07。

題校勘《四庫全書》硯》一詩中吟哦道：

檢校牙籤十萬餘，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頭白休相笑，曾讀人間未見書。<sup>93</sup>

正因為這番歷練，讓他得到了博學的聲譽：「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見稱於世者，惟曉嵐宗伯無書不讀，博覽一時」<sup>94</sup>、「我師河間紀文達以學問文章著聲公卿間四十餘年」<sup>95</sup>、「紀文達公昫學問浩博」、「紀文達公昫為昭代大儒，學問淵雅」<sup>96</sup>、「公貫徹儒籍，旁通百家」<sup>97</sup>，又被譽為「一代文宗」、「不愧一代之宗工」<sup>98</sup>，這些讚語都說明紀昫的學問受到推崇的情形。第三是讓紀昫有不願從事學術著作與保留文稿的心態。紀昫自稱：

今年將八十，轉瑟縮不敢著一語，平生吟稿亦不敢自存，蓋閱歷漸深，檢點得意之作，大抵古人所已道；其馳騁自喜，又往往皆古人所撓呵，撚鬚擁被，徒自苦耳。<sup>99</sup>

他的學生陳鶴也認為如此：

（紀昫）自校理秘書，縱觀古今著作，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盡其心思才力，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故生平未嘗著書，間為人作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即棄擲，未嘗存稿。<sup>100</sup>

也有人認為是精力盡瘁於編纂《四庫全書》上，因此不復著述，「說者謂公才學絕倫，而著書無多，蓋其生平精力，已畢瘁於此書矣」<sup>101</sup>。總言之，《四庫全書》因紀昫而更趨完善；紀昫則因《四庫全書》而學識更增，兩者相得益彰。

<sup>93</sup> 〈自題校勘《四庫全書》硯〉，《閱微草堂硯譜》，前揭書，頁 509。

<sup>94</sup> 昭槿：《嘯亭雜錄》卷十，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353。

<sup>95</sup> 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729 頁。

<sup>96</sup> 此二言前出自〈論紀昫撰述〉，劉聲木《菴楚齋隨筆》卷三；後出自〈四庫提要推重程朱〉，《菴楚齋續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65 及頁 232。

<sup>97</sup> 〈紀文達公事略〉，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台北：文海書局，1967 年，頁 992。

<sup>98</sup> 前語出自劉權之〈紀文達公遺集序〉中，後語出自李祖陶〈國朝文錄自序〉。

<sup>99</sup> 〈鶴街詩稿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06。

<sup>100</sup> 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 729。

<sup>101</sup> 《紀曉嵐文集》第三冊，頁 513 附錄引陸敬安《冷廬雜識》卷一言。